

魏根深和他的中国往事

本报首席记者 单颖文

他是剑桥大学毕业生,见过英国女王,上世纪60年代被派往中国教书;他是外交官,与邓小平谈笑风生,历经欧盟与中国建交、中国申请加入WTO的全过程,是建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发起者;他是学者,真正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用半个世纪写著《中国历史研究手册》,并在持续修订中……他是英国人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魏根深说他不会写自传,不过他给了本报独家专访的机会。于是在16个小时的访谈后,有了这些文字。

蹩脚的启蒙老师

魏根深至今记得,他第一次接触中文,是在1961年的春天。那时,他是英国剑桥大学最顶尖的国王学院的一名大二学生。那时,他还不知道“魏”是哪国文字。魏根深在剑桥读的是历史专业,因为念高中时,他成绩最好、最喜欢的学科是历史,但没想到,他很快厌倦了剑桥的历史课——因为这与他高中所学的历史课内容并无二致,“谁能想到我的高中历史老师,把他在剑桥读历史时的笔记拿来给我们上课?”

魏根深并不想重复学习,他决定自己找些有趣的东西。一天,他去逛剑桥书店,两册破旧的《Beginning Chinese》(《汉语初级教科书》第二版,时代出版社,1958)跳入眼帘。魏根深被吸引住了,停下脚步,打开书,一个个横平竖直的陌生字符扑面而来。“就像来到了一个新世界,我兴奋极了!”魏根深说,由于这两本书着实便宜得很,他毫不犹豫地当场买下,并决定自学中文。

魏根深开始频繁光顾中餐馆。一名在剑桥读东方学系研究生的美国学长,推荐他去一间叫“杭州饭店”的餐厅。魏根深很喜欢这家饭店,经常带着他的“汉语启蒙读物”前往,边吃边看。几次之后,他的“汉语启蒙老师”自动出现了。

这位老师叫侯新球,与魏根深年龄相仿,是店里一个普普通通的伙计。有一天,魏根深照例翻着他的《汉语初级教科书》等着上菜,侯新球跟他搭话,说自己注意他挺久了,“你想学中文吗?我可以教你”。魏根深喜出望外,作为回报,他答应教侯新球英文。两个十八九岁的少年约定,每周侯新球休息的那一天,便要上语言课——半天侯老师中文时间,半天魏老师英文时间。

魏根深说,学习中文的过程,其实也是他接触、了解中国人的过程。侯新球曾告诉他,自己是被蛇头从香港新界骗到英

国打工的苦命孩子,原本想挣几年钱回去改善家庭境况,没想到刚到英国就被蛇头没收了护照,没日没夜地干活却没有一文钱工资。魏根深去过侯新球的所谓“宿舍”,那是饭店的阁楼,12个人挤在一间没有家具的小房间里睡地板,有些人几乎睡在厕所里。即使条件这么差,侯新球却没有抱怨过,总是笑嘻嘻的,干活勤勤恳恳。这让魏根深很感喟,他虽然在剑桥见过很多有钱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他依然很佩服很穷也没读过什么书的侯新球,“我从未忘记过他,他是真正的decent man(体面人),是‘好的中国人’”。在魏根深的概念里,蛇头、饭店老板当然是“坏的中国人”的典型,这是他最早产生的对中国人的“二分法”。

过了2个月,魏根深发现侯新球教他的中文发音,和教科书上标注的读音老是对不起来。他有些纳闷,便去请教那位研究生学长。当对方得知侯新球是在香港农村长大、只有小学文化时,哈哈大笑起来:“你不知道中国有方言吗?你这是学了2个月的香港土话啊!”

可是侯新球真是个好心人,要怎么婉拒他的一片热忱?魏根深思前想后,对他的启蒙老师说:“我有点忙,可能没时间学汉语了。要不我继续教你英语,你教我怎么做中国菜吧?”

转读东方学系

自学了一阵子汉语,魏根深感到自己应该换个专业去读中国历史。他找到国王学院的教授,提出想转到东方学系,但教授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这样的转系需要许多准备,至少得提前学习古汉语。魏根深告诉教授他同样认同这些准备的需要,但他认为这应该由学校为他创造条件。教授答应他再想想。半年后,魏根深的申请得到批复。

1962年,21岁的魏根深大三,本该是毕业生的他(剑桥本科是3年学制),成了东方学系的一名新学生,并为此延期读了4年本科。当时,很少有人做

出这样的选择,因为东方学系异常冷门,尽管课程内容囊括了中国、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各类相关内容,但全班统共只有五六个学生。“那个时代,没有人要学习中文,大家都要学习俄语。”魏根深说,当时流行一种说法:If you are an optimist, study Russian. If you are a pessimist, you learn Chinese。(如果你是乐观主义者,就学习俄语;如果你是悲观主义者,才学习中文)。“因为冷战的关系,学俄语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学中文毕业后根本找不到出路。”

魏根深的古汉语是一位荷兰老师教的,另有两名中国老师教中国历史和文学,一位是考古学家郑德坤,另一位是张心沧。在魏根深看来,张心沧更有趣,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中国人性格中的委婉含蓄。张心沧从来不批评学生,学生犯了错误,他只是说“很好,但是可能还有更好的方法”。于是,调皮的学生们故意犯些越来越不像话的错,希望听张心沧说一句“不对”,“但我们始终没等到这天,他总是说‘好,好’”。

除了课堂学习,平时魏根深也很抓紧自己的汉语训练。由于剑桥没有开设汉语口语课,到了暑假,他就报了个在伦敦就读的暑期课程。他经常随身带个小盒子,里面装满了写着汉语的小卡片,“满脑子都是汉字”。一天,他来到国王学院的图书馆,竟然盯着一名女图书管理员的头发发了好一阵的呆。“您的头发组合成了几个汉字。”魏根深向对方解释道。说到这里,魏根深笑起来,“当时学汉语学得有点小疯狂呢!”

进入东方学系就读后,魏根深一直在找机会去中国。当时英国还没有中国大使馆,只有一个代办处。不过,这个代办处的所在地——波特兰大街49号大楼(今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很吸引魏根深。学习中国历史时,他了解了这栋楼的过去:清政府在英设立外交机构起,这栋楼即作为中国驻英公使馆、大使馆短期租用。1896年10月11日,孙中山前去探望

香港西医学院老师康德黎,路经波特兰大街时,早就盯梢孙中山的清公使馆官员邓延铿以广东老乡身份诱骗他进入公使馆喝茶,并将其关押在3楼一个靠窗的小房间内。后来,孙中山经过反复努力,做通了公使馆英籍工人柯尔和使馆女管家霍维夫人的工作,让他们告知康德黎自己被囚禁。康德黎几经奔走,又通过媒体呼吁,终于在孙中山被囚禁的第12天,由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出面照会清公使馆,依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孙中山被予以释放。

“如果没有当年的这一出,还会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吗?这个地方改写了中国的历史啊!”魏根深说,他带着剑桥大学李约瑟(Joseph Needham)教授写的介绍信,来到了代办处。没想到,当时“孙中山先生蒙难纪念馆”并不对外开放。他有些沮丧,但更大的沮丧很快到来——代办处的工作人员听完他的诉求,递给他一张纸,上面是一个地址,并告诉他如果想去中国旅游可以找这家公司,但旅行时间不能超过两周。“其实他们是不愿意见外国人到中国去。”魏根深说,这与他书上读到的17世纪30年代德川幕府颁布“锁国令”时期的日本非常相似,“没想到,学了2年中文,最后中国不欢迎我。”

难忘的面试

一年后的1964年5月,魏根深忽然收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打印着两行文字:“Do you still want to go to China? Can you go next week? (你还想去中国吗?下周能出发吗?)”落款是“中国驻英代办处”,写信人是代办处分管文化的二等秘书(second secretary)。魏根深说,当时去代办处的每个人都得留下个人信息,正好因为他延期了没毕业,才收到了这张寄往剑桥的明信片。

“这听起来很逗,但对我来说却非常重要,这是我与中国官方的第一次接触。”魏根深说,当时宿舍没有电话,所有表

示礼貌、尊重的通讯全是明信片往来。于是,他赶紧回寄了张明信片,写道:“Dear sir and secretary, I have not graduated, so I cannot go next week. I'd like to go when I graduate.(亲爱的先生,我还没有毕业,下周不能前往,我想等毕业后去中国。)”不久,他收到了代办处的回信,请他毕业后即去处里面试。

快毕业时,魏根深就联系了代办处的二等秘书,很快迎来了“这一生都没想到会被问这些问题”的面试。

面试魏根深的是包括二等秘书在内的2名中国人。主面试官是来自北京大学的老师,他的第一个问题是:“请问你读过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小说吗?”魏根深觉得很奇怪,能不能让我去中国为什么要问这个?他回答说读过。对方接着问道:“你能否列举他小说中提到的3位男主角和3位女主角?”魏根深更诧异了,他提了两三个名字,对方表示他回答得很好。“然后他的提问竟然就结束了!我有点懵。”

接下来,二等秘书开始向他提问。他记得很清楚,对方特地把椅子向他这边挪了挪,在

(下转3版) →

策划:

文汇报理评部

执行编辑:

李纯一 licy@whb.cn

封面编辑:

陈韶旭 csx@whb.cn

封面图片:

米兰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拱廊的马赛克地面

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关注文匯學人

